

上海青运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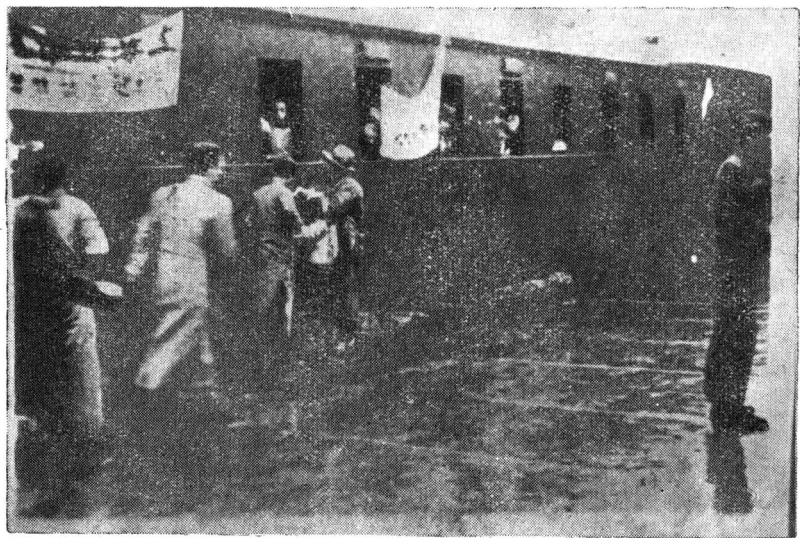
SHANGHAI
QING YUNSHI
ZI LIAO



▲ 二十年代上海地区
团的重要领导人张秋人



▲ 一九四八年五月上海学生在
反美扶日斗争中上街向市民宣传



▲ “一二·九”运动中上海学生晋京请愿

上海青运史资料

目 录

一九八二年
第五辑
(总第五辑)
1982年12月
25日出版

专 文

运用好这份教材……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 汪明章 (1)

专题研究

“五·二〇”学生运动与开辟第二条战线问题
……………陈修良 (4)

回 忆 录

五角星下迎胜利……………章 增 (11)
朱葆三路上的反美扶日斗争……雷仲平 史彤 (18)
狱中见闻……………刘鉴农 (22)

人物介绍

二十年代上海地区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张秋人……………叶炳南 (31)
党的好女儿里希……………赵先 费英备 (36)



运用好这份教材

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 汪明章

《上海青运史资料》（以下简称为《资料》）创刊以来已近一年了。这份刊物的问世和成长，得到了许多同志，特别是各方面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许多亲身参加过不同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老同志为《资料》写了生动感人、富有教育意义的回忆文章；不少史学工作者也发表了有关上海青运史研究的论文。《资料》发行后，受到了本市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的欢迎；外地许多单位和读者，也对它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我想借此机会，对所有关心和支持《资料》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学习和了解历史知识，正确地认识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培养起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祖国的崇高思想感情，这对于每个共青团员和要求进步的青年来说，是一门必修课。我国的历史，特别是现代史和近代史，内容极其丰富，而青运史则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青运史反映的是前辈青年革命斗争的史实，对于相同年纪的当代广大团

团员青年和团干部来说，就会倍觉亲切；而本地方的青运史，由于它的乡土特点，又会对读者产生较强的特殊吸引力。运用《资料》作为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既能使青年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又能使团的干部从中吸取做好新时期团的工作的经验，也有助于激发青年学习我国历史知识的兴趣和自觉要求。这一点，已为刊物发行以来的实践所证明。一位学校团干部说：“学习了《资料》，受到很大触动和教育。当年在国统区里从事学生运动的先进青年，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宁可自己受饥受寒，也要把募捐得来的粮食衣物现金救济给灾民；宁可自己骨肉分离，也要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南北转战；宁可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也决不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他们是八十年代团干部的楷模，我们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搞好新时期团的工作。”另一位工厂团干部在交流学习《资料》的体会时形象地比喻道：“团的历史好比一辆正在行驶着的长途汽车，我们八十年代的团干部是中途站上车，起点站在哪里不知道，《资料》帮助我们了解了从团的‘起点站’到现在的历史，使我们今后能准确地继续朝前开”。许多团员青年和团干部，通过阅读《资料》，产生了要求更多了解当年历史的愿望，从而主动去学习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由此可见，《资料》确实是对团员青年进行“三爱”教育的有益教材。

据我所知，本市许多单位的团组织已踊跃订阅了《资料》。如机电一局团委，黄浦区团委，上钢三厂团委，复旦、师院、华纺团委，以及绝大多数街道团委等基本上做到每个支部订阅一份。不少单位的团组织把它作为上团课、过

组织生活的学习材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不少单位的团组织还没有订阅这份刊物。目前《资料》发行量为一万四千份,但本市团的支部有近四万个,按照每个支部订阅一份的要求,差距还很大。还有些单位的团组织,虽已订阅了这份刊物,但没有很好地运用它。因此,团市委希望全市各级团组织都能重视运用《资料》,做好《资料》的订阅、发行和宣传工作,做好对阅读《资料》的组织指导工作。

一九八三年将要到来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继续抓好本市共青团学习历史,进行“三爱”教育的活动,使青年进一步加深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和发达。

* * * * *

上海学运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

最近,上海团市委、市高教局、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关于征集上海学生运动史资料的通知》。要求凡在解放前校内有地下党、团组织或外围组织活动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学运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领导,落实到部门,有人负责。其他学校要动员和支持了解学运情况或有志于研究学运史的教职员工,积极参加征集和研究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已成立上海学运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由团市委、市高教局、市教育局和上海交大、复旦、同济、上音、上海中学、南模中学、大同中学等二十多所具有较长学运史的大、中学校组成。

学运史征委会还聘请部分在沪的学运老战士和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为顾问。



“五·二〇”学生运动 与开辟第二条战线问题

陈修良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八年五月卅日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中，对“五·二〇”学生运动估价极高。他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这里说得很明白，首先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是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又推动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也就是展开了“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斗争的共同目标是反对蒋介石政府。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制订了镇压人民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可是压不住人民的怒火，回答他们的是伟大的正义的“五·二〇”学生运动和“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有人说“五·二〇”运动是指学生运动；有人说是工人运动；还有的人说是指整个国统区的人民革命群

众运动。这些看法都有片面性。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明了“开辟”第二条战线者是学生运动，随之发生了整个人民运动。从历史作用来说，民主革命时期，学生运动往往是人民革命运动的先锋。例如“五四”、“五卅”、“一二·九”运动。“五·二〇”学生运动也正是光荣革命传统的继续发扬。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种特殊情况。苏联十月革命之前依靠工人阶级作先锋，中国是年青的知识分子作先锋。这个规律是王明教条主义者所不理解的，他们轻视知识分子的革命力量，致使革命失败了。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地把学生运动看成为主要力量，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才能实现革命的理想，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规律。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正确地去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话就比较容易了。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五·二〇”学生运动是党领导的，还是群众自发产生的；是南京首先发动的，还是上海首先发动的？“五·二〇”运动时，我是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直接参加了这一伟大运动，所以对这个问题有必要讲一讲亲自经历的事实，免得后人发生无谓的争论。

一、“五·二〇”运动的历史背景

“五·二〇”运动首先发难的地点是在敌人心脏——南京。在国民党的首都，军警特务密布的地区能够搞伟大的群众运动吗？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但历史的事实确是这样：

“五·二〇”学生运动首先发生于南京。这个运动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这表明我们党汲取了民主革命时期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教训后，领导经验逐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五·二〇”惨案发生之前，南京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与法西斯统治进行不屈的斗争。“五·二〇”运动又是在上海局统一领导下，联合发动了京、沪、平、津等地学生共同斗争。“五·二〇”南京学生的流血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的一致响应，各界人士奋起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对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二〇”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正义的革命运动，是因为这个运动不是凭少数人坐在亭子间里瞎指挥出来的，革命的巨浪是党与人民紧密地团结一起，一浪推一浪地形成起来的。所以我首先要叙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历史背景，包括为什么会在敌人的心脏中爆发了“五·二〇”学生运动的客观条件。

一九四六年七月间，蒋介石政府发动了全面内战。他们错误地估计战争的形势，以为不出半年就可消灭“共军”，事实正好相反，前线不断失败，一九四七年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二百一十八个旅中，被我军歼灭者已超过了四分之一，蒋家王朝的统治开始动摇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北京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一案，掀起了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潮，参加人数达十万余，平津、京沪学生一致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政府的无耻行径，这个运动大大超过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规模。国民党的致命伤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导致财经濒于破产，生产停顿，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除了国民党少数的军阀、官僚之外，无不厌恶内战，弄得前线将士战无斗志，后方一片混乱。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南京的情况比上海更糟，因为它是国民

党政府的首都，败退下来的军官与士兵，涌向南京给我们当了义务宣传员。我亲耳听到败回南京的国民党军官说：“同共产党打仗是毫无办法的”。美式配备的八百万精兵，为什么在小米加步枪的“共军”面前束手无策，这就是打内战是非正义的。“五·二〇”运动打出的“反内战”口号，人民是非常拥护的，所以这个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势不可挡。

当时的“反饥饿”斗争，也是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举一例来看，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十三日，南京的大米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大学生的伙食费平均每人每天只能买一块豆腐，几乎快要断炊了。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的学生首先发动了反饥饿斗争。中大的地下党支部比较强大，立即召开了各系学生代表会，一致决定向教育部请愿，要求增加伙食费，要求五月份增加到每人十万元。饥寒交迫的中大学生宣布罢课后。十五日，南京的中大、金大、音专、剧专、药专等高等院校的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学生高举“我们饿，上不得课。”“炮弹乎，面包乎？”等旗帜，直奔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行政院院长王云五出来接见学生时说：“政府财政困难，不能把伙食费增加到十万元。”学生就反问：“财政困难，为什么还要打内战？”这样就把“反内战”、“反饥饿”口号结合起来了。学生当场高唱《你这个坏东西》歌曲，这是一首值得赞扬的好歌词：“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市面上柴米油盐不够用，你一大批一大批送上战场去，只管你内战为自己，学生的营养你是全不管……，别国在和平里复兴建设，只有你，整天在内战上玩把戏……嗨！你这个坏东西，真是该枪毙！”

南京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很快地得到各地的

支持。这是通过上海局的动员而联合发动的（上海局统管蒋管区的各大城市的党组织）。平、津、上海、浙江、江苏各大城市的学生立即响应，行动十分迅速。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也一致联合行动，如南京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党员少的地方，青年社的同学起了党员的作用，大量的社员后来都被吸收入党。

五月十九日，上海的交大、复旦、暨南、同济、上海医学院、音专、吴淞商船、幼儿师范，浙江的浙大，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等代表数十人，陆续到了南京。上海代表出发时，一万多学生送行。当晚在南京中大举行了京、沪、杭、苏十六个专科以上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五·二〇”请愿书的内容、口号、游行计划，推选了中大、金大、上海的暨大、复旦、交大、杭州的浙大、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等代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统一领导这次示威游行。

这次游行示威十分威严与英勇，我那天亲自到南京新街口去观看游行队伍，学生们高唱战歌：

“前进，中国的青年！挺战，中国的青年！中国恰象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游行队伍到了珠江路，国民党的军警便动手打人了。他们用水龙头冲，用铁棍皮鞭打，在堂堂的“首都”街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流血惨案。学生重伤十九人，轻伤一〇四人，被捕二十八人，共一百五十一人。

国民党的镇压，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愤慨，各界人士纷纷起来声援学生。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的：“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南京的

“五·二〇”血案后，马寅初先生到南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题目是“我们究竟怪什么？”他说：“……归根到底怪内战，内战要耗费庞大军费，政府滥发钞票，引起通货膨胀，人民自然不能活下去……”。

这就是“五·二〇”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的背景。

二、党的领导

南京“五·二〇”学生运动是群众自发的，还是党领导的问题，连国民党也清楚。现存历史档案中，有一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发言人肖铮的发言记载，他说：

“这次南京学潮，系由中大学生多次鼓动而起，据传中大学生尚遣代表前往上海及北平，故中央大学实为此次学潮的中心所在”。敌人说得对，“中大”确是我们的中心堡垒。可是在蒋介石的鼻子底下发生的“学潮”，决非“无理取闹”。我们党中央高瞻远瞩，重视国统区的工作，认为没有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党的隐蔽的地下斗争，要想迅速解放全国是不能设想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学生的抗暴运动成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行动，对这个问题，上海局曾讨论过，京、沪、杭地区的党组织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九四七年四月间，中央又有指示给上海局，要求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动学生运动。于是上海局通知我迅速回沪，讨论南京的学生运动。这次会议是在一个亭子间里召开的，它是上海局一个秘密机关的所在地。与会者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和我，专门讨论南京工作。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问我：南京有没有力量发动学生进行反对内战的运动？我汇报了南京的情况以后，大家认为已有足够的条件在国民党首都发动一次震惊中外的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为什么要在南京先发动呢，因为它是

“首都”，政治影响比上海大。随后还决定南京与沪、平、津、杭的各大城市学生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我回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市委有关同志开会，通知学生工作委员会立即具体布置，并决定首先由中大发动。因为中大是全国有名的大学，学生多，党员多，进步势力强，历次运动其他学校总是以中大为马首是瞻。敌人在中大的反共势力也特别大，在各班级安插了不少耳目，不过被人们称为“特务学生”的人，实在孤立得很，成不了气候。我们早已学会了对付的方法，这就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党的负责人不出面，在第一线的都有合法身份。党的组织分为几层，独立作战，又接受统一指挥，以防万一有人被捕，这个堡垒仍能保存下来。中大内部新青社的成员很多，在“五·二〇”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他各校也有“新青社”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活动，有点像共青团的性质，不过没有组织章程，它是当时南京学运中一支有力的队伍。

“五·二〇”运动发生后，“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南京学联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惨案的经过，通电全国，政治影响很大。上海交大送给中大一面绣有“开路先锋”的锦旗，上海大同大学送的锦旗上写道：“流血怕什么，倒一个会有千万个继起”。茅盾、郭沫若等纷纷写文章赞扬“五·二〇”精神，远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也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为了巩固胜利，党决定成立全国学联，去上海召开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先在麦伦中学，后在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等处开会。一九三〇年的全国学联因为抗战被解散后，历经十年又重新成立，从此开创了中国学生运动的新局面。



章 增

一九四九年初，严冬将过，春回大地。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军直逼南京，上海已见黎明曙光，明媚春天即将来临。

为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形式来了一个转变：由按系统改为按地区建立组织。组织上把我从市立中学区委调到徐汇地区中学分区委。分区委书记是钱其琛^①，委员是张效浚、吕甦、金祖德、刘凤飞和我。由我联系以复旦中学为主的几所中学地下党支部一个片的工作。我考入复旦中学，公开身份是一个普通的高中学生。同时，组织上又派遣许振苏、傅方恒、王士君、孙志丰等学生党员考入复旦中学，使这个党的力量一度几乎是空白的单位，又建立了新的党支部。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所中学积极开辟工作，把它建设成为徐汇地区中学学生运动的主要单位之一，以配合我军从西路解放上海。

注^①：现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党员由五名发展到三十几名

我联系复旦党支部后，钱其琛同志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在积极分子中慎重地发展一批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那时候，积极分子的政治情绪，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而日益高涨，从他们与党员一起悄悄哼唱的歌曲中，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思想脉搏。起初唱的是《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度过冬天，就是春天……”。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唱起了《我们的队伍来了》：“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渡江胜利时，就大哼《你是灯塔》：“……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发展新党员，已是积极分子的迫切愿望，也是斗争发展的实际需要。党支部书记许振苏和几个支委分别同积极分子一个个谈心交朋友、了解、考察和教育。积极分子提出入党要求，往往是从各自的不同情况和认识出发。有的是深感旧社会黑暗、腐败，青年无前途，寄希望于我党；有的是读了进步书籍，憧憬有一个公正合理、民主自由的新社会；有的是痛恨歧视妇女的恶习，反抗封建礼教，想做个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也有的是向往未来，想到党内来寻求真理，但又顾虑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殊途同归。我们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要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一步一步地把他们的觉悟提高到：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是这样，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通过党支部一点一滴的艰苦思

思想工作，一个一个地审查、上报、批准和接收的细致组织工作，使党员数从1949年2月的五名逐步发展到5月下旬上海解放前夕的三十几名，增加近七倍，从而使党在这个学校的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每个新同志入党后，由支委分工与他作第一次谈话。贝当公园(今衡山公园)、迪化公园(今乌鲁木齐路街心花园)等地是谈话的场所。由于工作的需要，当组织上决定我不再以学生身份在复旦出面，改为在校外联系该校党支部之后，我也曾找金再及、严天麟、许振福、瞿云康、方德泉、柯瑞祺等新党员谈过话，分别向他们讲了国民党“4·12”反革命政变和党的教训；讲了党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壮举；又结合当时党内的气节教育，讲了李大钊、瞿秋白以及王孝和等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总之，是告诉新党员入党后要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以至自己的生命。这些内容，都是我自己入党时地下学委李琦涛同志和曾领导过我的费福泉同志对我讲的，我再传下去讲给新同志听。谈话后举行入党宣誓：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带套的小木梳，抽出藏在套底下的一张小方纸，小得可以放在手掌心，上面写着新党员入党誓词。新党员低声念着，虽然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见，但却是那么庄重、肃穆。宣誓一结束，就把小方纸毁掉。新党员为获得新的政治生命而激动不已，我为党增加新鲜血液而感到高兴。当我回忆起这些，联想到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员“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倍感亲切，这个规定不正是我党一贯的革命传统吗？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尚且如此要求党员，何况执政后的今天呢！

发出警告信后的威力

不久，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可向某些人发出警告信，以分化瓦解他们。支委会慎重研究了发信对象，一个一个确定名单，对个别反动教师和学生，包括学校的训育主任，发出了一批警告信。信发出后，布置党员注意观察收信人的动态，果然，产生了威力：这些人的反动言行收敛了一些，其中训育主任的变化最为明显。

这个训育主任，平时一贯反对和压制学生运动，亲自规定：不准学生组织社团、学生会，未经校方同意，学生不得擅自召集任何会议，甚至连读书会都不许组织，住宿生外出都要追问。警告信发给他后不几天，他就主动来找平时比较出头露面、专做上层人物工作的支委王士君，说：“你生活上有些什么困难，有空我想找你谈谈”。他究竟想谈什么？是企图收买，进行破坏，还是迫于形势，试图改恶从善？我们从各个方面专门作了分析研究。鉴于此人并非国民党嫡系，也无较高反动政治身份，且又色厉内荏，决定采取“将计就计”，主动出击的对策。实施方案经上级批准后，由王士君独自找他谈话。为防万一，在谈话的办公大楼外，暗中布置了几个地下党员巡逻、保护王士君。

谈话是在一个晚上进行的。

“不知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法？”对方一开始就问。

“你对形势怎么看？”王反问。

“国民党是肯定打败了，不过共产党是否一定能进上海？”对方提出了疑虑。

“解放军一定要进军上海，也一定能打进上海”。王士君以平时关心时事形势的学生身份，根据新华社社论《将革命